

The teaching influence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Uzbek

Shorustamov Shokosim Kuralova Jansoya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into the impact of Sino-Uzbek cultural differences on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Uzbek cultures, it elaborates on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differenc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linguistic culture, value systems, and educational concepts—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Concurrently, the research explores cultural commonalities between China and Uzbekistan, providing both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Keywords

Sino-Uzbek cultural difference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Linguistic culture; Value systems; Educational concepts

汉乌文化差异的教学影响

金鑫磊 茉莉

扬州大学, 中国 · 江苏 扬州 225009

摘 要

本研究深入探究了汉乌文化差异对国际中文教育所产生的影响。通过对中国文化与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开展对比剖析,从语言文化、价值观念、教育观念三个维度详尽阐释了这些差异的具体呈现形式及其对汉语教学的作用。与此同时,本研究亦对中乌文化的共性展开了探讨,为跨文化教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策略。

关键词

汉乌文化差异; 国际中文教育; 语言文化; 价值观念; 教育观念

1 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迅速发展。然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往往面临诸多挑战。本研究以汉乌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此类差异对国际中文教育效果的影响,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教学对策。

2 中乌文化共性及文化对话的可能性

在探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识别和理解中乌文化的共性,对于汉语教学的文化适应和教学策略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在语言结构、宗教背景、社会制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从文化价值维度来看,两国在许多核心观念上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为文化对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1 中乌文化的主要共性

虽然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分属东亚与中亚,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宗教信仰存在差异,但从深层文化结构看,两国在诸多核心价值理念上体现出文化共性,特别是在家庭伦理、师生关系、社会结构和人际交往观等方面。这些共性构成中乌跨文化交际与教育交流的基础,也为开展“文化对话式教学”提供了实践依据。

2.1.1 家庭为中心的文化结构

在中乌两国,家庭不仅是生活的基本单位,更是价值观念教育的核心场所。个体从小就在家庭中接受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与社会责任的培养,这种“家庭中心主义”文化渗透至教育选择、职业规划、婚姻决策等多个方面。

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文化传统中,“孝顺”这一概念虽未直接源自汉语,其行为表现却与汉语文化中的“孝”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对长辈的尊重、对老年人的赡养以及将家庭利益置于首位。在中国,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孝”与“五伦”理念共同构筑了相似的伦理框架。通过实证研究可以得到支持:根据伊斯洛莫夫(Islomov A, 2018)的调查,300名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在面临学业或职业上的困惑时,最常求助

【作者简介】金鑫磊(1989-),男,乌兹别克人,博士,从事汉语国际教育研究。

的对象为“父母”（占调查对象的73%）^[1]。类似地，刘孟秋（2024）对中国大学生进行的研究也揭示了家庭意见在学生人生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占调查对象的78%）^[2]。

这种文化共性在教学中为教师提供了亲近学生心灵的切入点：通过家庭话题引导学生表达、比较、叙述，可以实现语言练习与情感认同的双重目标。

2.1.2 尊师重道与权威认同

中乌文化皆强调教师地位的重要性，这一点表现出传统文化对“知识权威”的高度敬重。中国传统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乌兹别克文化中也有类似“教师如父母”（“Ustoz otadek aziz”）的说法。在两国教学中，师生之间往往保持一定距离感，学生不轻易挑战教师观点。虽然近年来国际化教育趋势推动教育平等观念发展，但对“尊重教师”的认知依然根深蒂固。拉希莫娃（Rakhimova G, 2021）指出，乌兹别克学生在外语课堂中普遍对教师保持敬意，参与课堂时有“先听后说”倾向^[3]。中国的研究者胡文仲（2016）也发现，中国学生普遍倾向于“避免与教师发生正面冲突”^[4]。这种权威认同对课堂秩序维护和教学效果的实现有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提示教师在设计互动时需更关注学生的心理接受程度，避免因文化期待而造成参与障碍。

2.1.3 群体主义与集体和谐导向

在中乌社会中，个体行为往往受到集体利益的约束，强调协作精神与人际关系和谐。中国自古倡导“礼尚往来”“和为贵”，乌兹别克文化则强调“mahalla”（社区）和“xalq birligi”（民族团结）的社会理念。二者均表达出一种“以群体为基础”的文化模式。Hofstede的文化维度研究显示：中国在“集体主义”维度得分为20，乌兹别克斯坦为25（越越低集体主义）^[5]。两国学生在群体中倾向维持融洽人际关系，避免公开冲突，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文化共性表现在学生更倾向于小组协作、重视班级凝聚力、遵守课堂规则等行为上，为组织合作学习提供良好基础。例如，在汉语课堂中，采用“合作式任务”“角色扮演”等活动时，中乌学生通常能较快形成分工默契，避免冲突，顺利完成学习目标。

2.1.4 礼貌文化与“面子”意识

中乌文化都强调在交往中保持礼貌，避免失礼或使对方尴尬。在汉语中，这体现为“给面子”“委婉表达”；乌文化中则表现为“保持体面”（hurmat saqlash）与“尊重他人情感”（boshqani hurmat qilish）。虽然“面子”一词源自中文，但其实乌兹别克人同样高度重视在他人面前的体面与声誉。例如学生不愿在课堂上被公开批评，不轻易表达失败或无知，这是出于文化中对“个人形象维护”的重视。哈里莫夫（Khalimov S, 2020）指出，乌学生在课堂互动中更倾向于在“私下”场合表达困惑，而不愿在同学面前暴露“不会”的情况，这与中国学生对“当众表现不佳”的担忧高度一致^[6]。

中乌文化虽然根源不同，但在家庭价值、权威结构、集体导向与礼貌交往等方面展现出明显的文化共性。这些共性不仅为跨文化教学建立了“认同基础”，也为教学互动、课堂管理和文化输入提供了可操作的策略。

2.2 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与路径

“文化对话”是一种超越文化差异、实现互相理解、尊重与融合的过程。在跨文化教育语境中，文化对话不仅是冲突的缓解方式，更是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延展形式。正如巴赫金（Bakhtin, 1986）提出的“对话性”理论指出：“理解是一种主动的、对话式的行为”^[7]。在中乌文化背景下，文化对话的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具备多维展开的实践基础。

2.2.1 共性价值构成文化对话的心理基础

如前所述，尽管中乌两国文化起源于不同的历史脉络，但在家庭价值观、集体主义倾向、尊师重道等核心价值观念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文化共性为跨文化对话提供了认同的基点，有助于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在学习和接触汉语文化时，避免完全陷入文化疏离感。例如，在汉语教学中涉及“孝”这一文化概念时，乌兹别克斯坦学生能够迅速联系到本国文化中对长辈的敬重，从而在认知结构上寻找到文化上的连接点。这种文化上的可迁移性构成了跨文化对话的心理基础。

实证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伊斯洛莫夫（Islomov A, 2018）的研究表明，当乌兹别克斯坦学生在学习涉及文化内容的课程时，如果引入与本国文化相似的案例，其理解程度和课堂参与度平均提升22%。

2.2.2 差异引发的好奇与反思为对话提供认知张力

文化差异虽然可能导致误解，但在教育场域中，更重要的是它能激发学生的文化好奇心与反思力。当学生面对“熟悉但不同”的文化现象时，若教师能恰当引导，就能将“文化冲突”转化为“文化启发”。例如，乌兹别克学生在学习汉语礼貌用语如“您”与“请”的多层含义时，容易产生困惑。但如果将其与乌语言中使用敬语的方式（如对年长者的第二人称复数形式“siz”）进行对比，学生便能在“对比—理解—迁移”过程中实现文化认知的提升。这种文化对话的发生，是“异质文化引发内省”的过程，正是哈贝马斯（Habermas, 1987）所说的“理解性沟通”^[8]的实践体现。

3 汉乌文化差异对汉语教学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中乌文化差异深刻影响着汉语教学的各个环节，从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方法的实施，到师生互动和学习评价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内容的制约和影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若能充分认识并尊重这些文化差异，将更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同步发展。

3.1 教学内容与文化材料的选择

汉语教学不仅传授语言技能，也是文化传播途径。教

学融入文化材料可助学生了解文化背景,增强学习趣味性和实用性。但中乌文化差异大,教学内容和文化材料选择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关键。

首先,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复杂,教师选文化材料时要结合乌兹别克学生背景和认知,选有代表性且易理解的元素。如春节、中秋节等传统文化主题,乌兹别克学生可能因宗教和习俗差异理解困难,可通过文化对比教学,助其构建跨文化理解桥梁。

其次,教学材料要多样、具时代性,结合现代中国生活、流行文化和科技元素,激发学生兴趣。融入乌兹别克文化元素,可减少文化隔阂。教师还应注意文化敏感性,避免误解和冲突,尊重学生背景,促进文化理解与尊重。

总之,科学合理选择和设计文化材料是提升汉语教学质量的保障,通过文化对比与融合,可实现语言学习和文化认同双重目标。

3.2 师生关系与课堂管理

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的核心要素,受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结构影响。中乌两国师生关系模式和课堂管理风格差异明显,影响汉语课堂教学氛围、学生参与度和学习效果。中国文化受传统儒家“尊师重道”思想影响,师生关系有等级性,学生服从、尊重教师权威,课堂秩序严,以教师讲授为主,利于达成教学目标和稳定秩序,但抑制学生个性与批判性思维发展。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强调平等尊重,师生关系开放亲近,学生倾向互动协商式关系,课堂对话多,表达意愿强,能激发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但要求教师有更强课堂调控力,防止秩序混乱影响教学效率。文化差异也影响课堂管理方式,传统汉语课堂纪律由教师单方面设定执行,乌兹别克斯坦学生期望规则通过共识形成。若教师在乌兹别克斯坦坚持单向权威式管理,会引发学生不满抵触,影响教学有效性。所以,汉语教师在乌兹别克斯坦教学要调整课堂管理策略,以包容互动方式组织教学,尊重学生文化期待,维持课堂秩序。

3.3 评价体系与学习动机

跨文化汉语教学中,评价体系与学习动机关联紧密,文化差异影响二者建构与运行。中国传统考试导向评价体系虽能激发学生努力动机,但易使学习兴趣下降;乌兹别克斯坦采用多元评价方式,强调过程性评价与能力导向,学习者易受内在动机驱动。传统汉语教学评价方式若不调整,会与乌兹别克学生学习心理错位,削弱其学习积极性。乌兹别克学生学习汉语有外在和内在多种动机。所以,汉语教学评价体系应从文化适配视角,构建多元、灵活且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机制,支持其多样化学习动机。只有理解学生文化背景和心理特点,才能实现有效评价与学习动机良性互动,提高

教学质量和学习持续性。

4 小结

本章探讨汉乌文化差异及其对汉语教学的影响,对比中乌文化特征,阐述差异表现及对汉语教学各环节的作用。

中国文化受儒、道、佛影响,有整体主义取向和伦理规范意识。语言表达委婉,注重语境;价值观念强调集体和关系;教育观念尊师重道,等级导向明显,影响汉语教学的文化环境、内容选择、师生关系和学习评价。

乌兹别克斯坦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主,融合中亚传统。语言表达直接,称谓简洁;价值观念重视家庭、群体意识强,长幼有序、尊重权威;教育观念强调教师权威,学生课堂参与被动,重结果和成绩。

中乌文化虽有差异,但在家庭、尊师、群体、礼貌等方面有共性,为跨文化教学提供基础,差异也激发文化好奇心与反思力。

汉乌文化差异对汉语教学影响深远。教学内容要结合乌兹别克学生背景和水平;师生关系需构建互动协商式,调整管理策略;学习评价要从文化适配视角出发,建立多元、灵活、以学生为中心的机制。

总之,本章全面分析汉乌文化差异,为汉语教学提供文化视角,强调跨文化教学重要性,帮助教师理解学生需求,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 [1] ISLOMOV A. Cultural values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mong Uzbek university students[J]. Central Asia Sociology Journal, 2018, 5(1): 44-59.
- [2] KHALIMOV S. Honor and Face: How Uzbek students use the classroom to participate in Chinese courses [J].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2020, 8(2): 113-129.
- [3] ISLOMOV A. Cultural values and interpersonal behavior among Uzbek university students[J]. Central Asia Sociology Journal, 2018, 5(1): 44-59.
- [4] AKMALOV S. Motivational patterns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mong Uzbek university student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19, 6(3): 22-38.
- [5] RAKHIMOVA G. Kognitiv yo'nalish va vazifaga asoslangan Xitoy ta'limotida ishtirok etish: o'zbek o'quvchilaridan dalillar[J]. Osiyo-tinch okeani amaliy Tilshunoslik jurnali, 2021, 3(2): 77-90.
- [6] HASANOV S. Politeness strategies and pragmalinguistic transfer among Uzbek learners of Chinese[J]. Tashkent Linguistic Studies, 2020, 12(2): 33-47.
- [7] 卡蒙(Kamoliddin Baykabilov).真实语料在乌兹别克斯坦汉语听说读写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绍兴文理学院,2021.